

村委会选举中的农民冷漠及其缘由

——高坪村选举的跟踪调查与思考¹

戴利朝

(戴利朝: 中山大学 2003 级博士生 广州 51027)

摘要: 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已成为农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中农民的反应到底如何。本文通过对高坪村选举的跟踪调查,反映了村委会选举中农民的冷漠并分析了其缘由。

关键词: 村委会选举、农民、冷漠、缘由

1. 问题的提出

公历 2002 年 12 月 30 日,这在农村并非一个特殊的日子,高坪村更没有元旦节日就要来临的丝毫气氛。一大早,带着一个红纸包装的票箱的刘良增会计便从下屋村来到村支书陈贯亮家²,他与肖家的肖先芳、龙家组组长龙期茂,负责陈家片和岭背组的流动投票工作。而陈书记等三人负责肖家片和栗湖、下屋两组的流动投票工作。清晨七点半两个组便分头开始一天的走门(村)串户的历程。两个组中午 2 点在村委会汇合³,午餐后奔向岭背片,直到晚上 6 点结束投票。

然而,面对村干部的“起早摸黑”、“送票上门”、“再三劝说”,并不繁忙的村民却对于选举表示公开的冷漠。如果对比 1999 年选举⁴更会发现这点,本来按镇里统一确定的期限,99 年选举时正值村民忙于甘蔗收割,而且延续更长,这显然极不利于选举,而 2002 年推后了半个多月,蔗农基本上收割完所有甘蔗,村民大多空闲。这样两个不同的背景下,选举的热闹场面与村民的参与程度却不同。99 年选举场面中“热热闹闹”、“人头攒动”的场面 2002 年没有出现,村民不仅不积极,而且更显消极。高坪的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我们课题组其它成员 2002 年底对同省多村的调查来看,答案是肯定的⁵。

已有学者发现了选举中的农民冷漠现象,但更多的研究止于提出问题⁶,或泛泛而论。事实上,农民对选举的冷漠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冷漠,而政治冷漠(Political Indifference)是既可相对于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而言又可包含在政治参与中的一个政治概念⁷,前者意味着对政治的不参与,后者则意味着对政治的消极参与。高坪案例正体现了这点。

2. 选举中农民冷漠的体现

选举中农民冷漠体现在两个方面:不参与选举活动,主要是不投票,也不对选举发表任何评论;消极参与选举,主要体现为应付式或完全被动地投票。陈书记代表选委会在总结 2002 年高坪选举时认为,2002 年选举比 99 年有很大进步,体现有三:90%以上参选率,候选人不参加选举工作,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没有进行第二次选举。如后所述,前两点并非事实。所谓高参选率,实际上是高代票率。在选举前,陈再三强调工作人员要确保“参选率”,不能再“吃倒饭”,任何人都要填票(这本身就说明了陈书记等事前已经意识到村民对选举的冷漠)。的确,工作人员只要见到选民甚至青少年,就会将他(她)家所有的票都给他(她),不少人最终“投票”了,但体现的岂能是“心目中的人”?投了票的村民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态度:一是,应付式投票。选民起先要么百般推诿,或根本不予理睬,碍于工作人员的面子,最终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匆匆划圈了事,或者干脆要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填写的工作人员划票。这类选民并没有花时间考虑或鉴别候选人情况,比如在路上遇到的人多数属于此类。在陈家,我们转悠了许久,好不容易遇见正走到家门口的一位青年妇女。起先是龙向她先打招呼,刘

则找到名字给她看，肖则劝说随便选谁，但任凭他们三人怎样说，妇女仍不愿填。由于较为典型，不妨将工作人员（简称“工”）的劝说和她的“答复”选录如后：

工：“你家两张票，你和你丈夫一人一张”；她：“我男人出去打工了，我代表不了他”。

工：“随便你写谁”；她：“我瞎字不识（即不认识字）”。

工：“你告诉我选谁，我帮您写”；她：“我不认识这些人（指选票上的候选人）”。

工：指着名字逐一告诉她候选人的乳名（村民日常称呼就用“乳名”或绰号）；她：“随便谁当，我没关系，无所谓”。

工：“那你就随便选谁都行”；她：“我不签字”。

工：“你指一下，我帮你划，不用签字的”；她：“那你们自己写（选）”。

工：“我们不能自己写，写了没用”；她：“选主任有什么用！（书记是一把手）”。

至少有七个回合的“交锋”，最后，或许是见四个人都站在自家门口影响不好（而我又是外人），她只得让肖代她填写了选票。二是随大流式投票，在岭背，在刘国顺组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户人家，见到大约有十个年轻男女围坐在火炉边，工作人员觉得是个好时机，便按照户口数，分别将个人自家所有选票发给大伙，尽管也不忘叮嘱一句：“大家各选各的，随便选谁都行”。其中一妇人说：选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这些人“吃我们剥削”（意即贪污）？另一人随即附和说，是呵，随便选吧，你还以为人家会拿我们选的作数？大伙说笑间，把几十张票（互相对照着）填完了（有两个青年干脆懒得动笔，“口授”邻座同样地帮他划），并一把塞进票箱。在陈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不过聚集的人没有这么多。三是弃权，即虽然接过工作人员所给的票，但听说可以弃权，便根本不填就将原票塞进了票箱。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工作人员最后的统计，这方面比例也不低，约有十来个人。其实在笔者召开的座谈会上，组长们普遍承认，本组提名时多由自己定名单，填选票，因为各组弃权的选民数几乎超过一半（也有人说更多）。当然，也有少数人是主动投票的，即工作人员和候选人以及其它当事人。但主动投票者也是将自家所有票甚至已分家的父母兄弟的票“包办”了。有趣的是，曾家组长钟兆文明确表示不代属于本村村民的岳父岳母投票，他说这样做，“恐怕被群众认为自己有意图”。然而，像他这样拒绝代票的选民极少，选民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以完成任务为主”，并不管数量。从笔者所作的问卷来看，选择“无所谓，谁当都一样”的比例在90%以上，这也证明了村民普遍之冷漠。

另一方面，选民的冷漠也体现在工作人员的难处上，一是动员难。前述曾家组的投票较为顺利是由于组长钟兆文动员的结果，据笔者事后调查和钟的自述，钟的动员依据并非是“选举投票”，他是叫村民来领防洪所需的树苗。那些村民就奇怪没见到树苗。以钟在曾家的威信，他还要用这种“骗”的方法，可见动员之难，事后钟说：“不这样，没有几个人会来投票的”。在比曾家组户口数多两倍的陈家组，也是组长而且兼为候选人的陈贯清，他就没叫到几个人。让工作人员伤脑筋的是，面对朝夕相处的村民，他们有时很难说服对方填写选票。路遇不少村民就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自己填掉还省得走！”二是找人难。为确保达到“参选率”，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即遇到一个选民则“如获至宝”。工作人员并不在乎选民是否认真投票。

观察选民冷漠的另一个视角是候选人及其支持者的竞争程度。两次选举的焦点都是陈氏和刘国顺的副主任之争⁸，但其结果都是后者落选。不同在于：一是与后者竞争的当事人先是陈贯志，后是陈贯清，而且这二人是兄弟，陈贯清为现任陈家组组长。二是，99年之争，刘的落选是由于选票的不够；02年选举刘的落选则是因为组织的裁决，根据31日统计结果，刘得585张票，陈只得513张票。陈书记以及镇张书记的解释是因为刘超过45周岁，不符合当选者的年龄条件；而且如果贯清落选，则村委会全为刘姓（除刘贤花是肖家人外），将

不便开展工作，所以让陈上。但事实上，据刘本人和刘主任的介绍⁹，候选人定下后，刘国顺便向选委会表示不参加选举，结果陈书记未同意。而且既然刘年龄不符，为何还要确定他为正式候选人，事实上，刘的年龄也未必是个问题，因为他正好 45 周岁。在选举前，陈贯清和刘国顺两人并没有什么“活动”，而都是在正式流动投票那天分别负责本组“叫人”或带路，这对选举投票的影响也仅限于投票者。当然，选举前夜，陈曾请陈书记“吃狗肉”（后者以要陪我们为理由未去），当不仅是因为属堂兄，意图也在于选举结果。除当事人外，未像 99 年那样有其它支持者的活动。相对于副主任之争而言，主任之争更无悬念。其实主任之争也是发生在陈氏和刘建华之间，99 年选举与刘竞争的是时任陈家组组长陈乐平，他于 2000 年在圩上开了一家茶馆，不仅没再当组长，而且也没有成为 02 年候选人；02 年与刘竞争的是陈凡平，99 年他是选委会成员之一，现在镇上初中食堂煮饭。据陈书记介绍，他本来想让村委会成员陈贯志与刘竞争，但镇里上半年刚因为他参与斗殴而处分了他，不同意他成为候选人¹⁰。因而陈书记确定让陈凡平成为刘的“陪选”，并且没有通知陈凡平或者征求他的意见¹¹。事实上，刘具有多年资历（又是现任主任）、善于交际、处事灵活，与各方面都“谈得来”。结果，与 99 年选举一样，刘的当选在众人意料之中，毫无悬念。也因此，无论当事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为主任的选举而活动甚至费心。据笔者调查，陈凡平根本就对选举的情况毫无所知，也表示即便知道也不会去“活动”。而刘建华主任在选举中尽管依然被陈书记要求参与协调和动员工作，但是直到 31 日计票时才出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可以完全不在场”¹²。

3. 学界的已有分析

农民对选举缘何冷漠？以往学术界虽对此较少专门的论述，但仍然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路和观点。有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笼统论述政治冷漠这一现象。杨光斌指出，政治冷漠的成因有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三种变量，这些变量又可化约为四个具体因素，即政治主体“对报酬的估量”、“对选择的判断”、“政治效能感”以及“对结局的满意感”（杨光斌，1995）。刘德霓从宏观层面系统分析了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认为“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参与体制”、“初级阶段的经济状况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当代中国公民团体不发达”分别是产生当代中国政治冷漠现象的制度根源、经济根源、历史文化根源以及组织根源（刘德霓，2002）。

在寻求农民政治冷漠的原因时，更多学者从以下角度立论：（1）农民文化素质或传统政治意识。农民冷漠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刘德霓，2002）。先看后者，有人依据列宁所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以及国外关于政治参与的大量研究所得出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跟他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成正比”的成果，并结合中国现状认为，农民缺乏民主必备的素质。我们不否认，一定的文化素质是公民参政的前提和基础，也不否认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仍有大量文盲、半文盲，但是，落实到村级选举和村级治理，我们却不能认定他们“无所谓参与意识，也无所谓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刘德霓，2002）。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现代乡村的政治内容既不深奥、程序也不难懂，农民也许因为能力欠缺而无法作出符合我们常识的判断，但他们自有其行动逻辑和判断标准。人们习惯于将识字和“有文化”划等号，其实以乡村生活而言，这亦可存疑。在对村民自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时，有学者已经从理论与实证结合的角度对此予以反驳（项继权，2002），很多个案选举调查报告也反驳了这点。笔者在此只想指出，我们课题组 99 年对江西省 39 个村的田野调查表明，只要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大多数农民表示了积极参与的热情和态度，而且其参与选举（表达意愿）的技术与水平并不低下，农民的文化素质并没有成为民主选举的主要障碍；而即使对选举表示冷漠的农民也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对真正民主的

期待和希望（肖唐镖等系列成果，2002）。高坪农民在2002年选举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点，有两位老人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龙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儿子媳妇外出打工，自带孙儿孙女在家，听说是选举村委会干部，她要求龙期茂解释填写的方法，并告诉她选票上的几位候选人具体所指，待一一弄懂后，她拒绝了刘会计的帮助，而走进家门，戴上刘会计借给她的老花眼镜，一共填写了两张票，走出来又自个塞进票箱。另一位是陈乐平的母亲，也有近七十了，她也是避开众人在屋中填好选票，后卷成一卷交给肖先方帮她塞进票箱。我们发现，农民主要的障碍是由于不认识候选人的书名，因为习惯了日常称呼（乳名或绰号），以及不熟悉选举操作方法（因为选委会介绍不够和提名未普及），而并非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以致不知道该如何选举。而且，对中国农民而言，选举这一新生事物毕竟来得太晚，还有一个习惯过程。其次看前者，政治文化问题较为复杂，不易论证，此处也是尝试探讨。论者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来看的依据是，中国“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造成人们的政治冷漠。其实，历史发展至今，随着传媒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并不等同于传统，而且与其说农民崇拜权威，过分依赖“清官”、“仁政”，倒不如说农民的革命性同样强大，其参政的欲望并不低于城里的精英，改革前“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点。（2）农民经济理性论。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都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改善他们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1989，第56页）有学者据此将农民冷漠归因于农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加上对经济利益的十分关注，人们没有多少时间、精力也没有多少兴趣去了解决策程序、分析决策效果、获取决策信息”；而且“相对于参与政治生活来说，普通民众在经济领域中显然更容易实现和满足个人的利益，从而退出政治参与”。（刘德霓，2002）然而普遍而言，该省农村的选举时间都定在农闲时，这就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换言之，不繁忙的村民完全有时间参与选举，并且利益并不受损，参与选举的成本极为低廉。而且，对选举的参与也可能换来更大的经济利益。（3）社会流动论，实质也是对经济利益的考量。诚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参与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机会增多，参与面扩大，社会成员流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广为关注的“民工潮”，这种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转移和消解了人们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个人利益的信念和动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流动”，对更多的村民来说，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也未必以流动为最佳。（4）公民团体论。有学者或受西方民主制度成因而的启发从中国“公民团体”发展的角度，或依据中国农村经验调查从“社会关联”¹³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前者的依据是“团体政治”与“组织参与”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且如亨廷顿所说：“如果人们加入某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活动，那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1989，91页）我们不否认，在当代中国，公民团体总的来说还不发达，“政府控制社会生活的能力仍十分强大，而社会上利益群体还不够发达且自立性不强、社会自治程度较低，中国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仍相当低”，而且农民至今没有自己的组织，这对农民参与政治相当不利，但未必可以说有了组织，农民就不冷漠。比如，不少地方宗族组织对乡村政治生活的介入仍小。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是否有“组织”。而后一种视角侧重于从选举结果的一致性角度立论，而选举作为一个程序的特征意味着选举的变量较为复杂，并不能以结果决定行为。

4.农民冷漠的多重缘由

上述这些因素都有一定道理，可以启发我们更为全面地探讨农民政治冷漠的缘由问题。就高坪个案而言，笔者认为，对农民选举冷漠的原因分析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1) 聚焦于选举

其实 99 年选举农民冷漠现象已经体现出来,但在 2002 年选举中更加突出而普遍。农民更为冷漠,其原因可追溯到对 99 年选举结果的破坏。平心而论,高坪 99 年参与选举的村民大都相信选举的真实性与民主性¹⁴,他们在参与的同时对现实的改变和未来亦寄予了某种希望¹⁵。然而,对未来的这种憧憬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其原因首先在于刘祥云的留任:选举结束后不久,在村干部会议上,落选的刘祥云依然不“落位”;随后的工作中,他依然是一名村级干部,依然享有相应的工作补贴。据刘自己说,先是搞“老本行”即治保主任,每个月工作补贴得 40 元,后来曾礼明南下打工,又兼其计生专干一职,每月拿工资 90 元。然而,在百姓眼中,刘祥云并不具备作一名村干部的能力¹⁶。这也是 1999 年选举他落选的主要原因。其实还在 99 年选举刚结束陈书记表示将让刘留任时,在座就有干部表示应尊重选举结果。但陈等依然推翻选举结果,“聘”刘留任。其次,2001 年 8 月,民选的计生专干曾礼明南下打工。原因为何?2002 年笔者驻村期间,据陈书记说,曾去年南下之前,跟自己解释说因为没收入要去打工。但龙一游介绍,曾是因为“得罪了乡里的干部”,遭排挤,被迫南下打工。具体原因也许很难确知,重要的在于,对此事村委会没给广大村民一个交代,而只是让刘祥云兼其工作。对于曾刘的变动,高坪大多数村民并无具体的意见,但正如有村民所说,干部的任命还是干部说了算,选举没丁点作用。由于岁月的流逝,如果说,99 年选举刚结束刘祥云的留任是对该选举结果的无情更改而只在当时让有心者愤恨的话,那么曾的去职则给遭遇 2002 年选举的村民提了个醒儿:选举没用!而刘曾事件的叠加对村民冷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 02 年选举结果(票多的刘国顺依然落选)只是再次告诉村民:乡村干部并不尊重他们的选票,他们不过视之为“儿戏”¹⁷。

农民的态度还与他们对是否属真选举的判断紧密相关。2002 年选举的明显退步体现有三:其一,选举缺乏充足的准备,不少人未经历提名选举而感到突如其来。政治学理论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的开放、流畅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所指出的:“政治参与要求接收关于政治的一般的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取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安东尼·奥罗姆,1989,第 293 页)对选举信息的获致程度,无疑既来自村民的主动,又取决于组织的开放,而后者在分散的高坪村尤显关键。根据村委会工作记录和笔者的参与观察,1999 年选举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和步骤¹⁸,选举正式会议就开了八次,加上共餐时工作人员为选举的交流次数更多。而 2002 年,据村委会工作记录,整个选举只有两个记录:成立选委会,30 日正式选举。据笔者的调查访问,村民们没有初选、提名候选人的丁点印象,包括掌管选举材料的刘会计在内的选委会、候选人对选举尤其是预选情况大都支支吾吾或语焉不详,选民登记本也只是刘会计保存的日常收税的依据的各户统计表。而正式选举就是 30 日两组的走村串户、31 日计票并公布结果。专门召开的选举会议只有两次,附带提及选举的只有一次。这些意味着选举之突然。可想而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所谓“民主选举”(正式流动投票),村民心中的疑问如何能轻轻抛弃?其二,镇里出场少,更加剧了村民对选举的怀疑。99 年选举,乡里的指导与监督更积极,不仅派蹲点干部(也是副乡长)直接参加整个选举过程,而且在正式选举日加派一名副书记带两名干事亲临现场,既指导又监督选委会及其它工作人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平常只在收“上交”时可见的乡干部这种“出场”则意味着对选举的“重视与较真”,而 02 年选举,这种局面显然缺乏。据笔者对蹲村干部郭氏的访问,他对整个选举了解非常少,不清楚村里的选举工作安排和“初选”结果,而只是再三表示“因为忙,未参与此事,且不知情况,但会支持监督陈书记工作”。镇里(高坪所属乡已改为镇)的干部仅先后两次露面,如匆匆过客¹⁹。其三,选举过程中的非民主操作。首

先体现在选委会的名单基本上是由陈书记拟定，形式上报镇里批准和村组干部会议通过，并没有普通群众代表参加，而作为这次选举中唯一正式的组织的选委会，也基本上由选委会主任陈贯亮说了算。陈还一手敲定作为此次选举最关键环节的流动票箱的工作人员。本来，选委会有五人：陈书记、刘主任、刘会计、陈永华（陈家老组长）和肖先芳（既是妇女主任也是候选人刘贤花的公公），刘主任成为候选人后不便参加，但一个票箱至少要三个人（分别负责发票、提箱、登记）。陈书记就在两组各增加一人。一即前述龙期茂，龙是陈家人的女婿，“自然支持书记的工作，亦卖他面子”（龙自述），而刘已经习惯了陈的指挥，肖更是唯唯诺诺。事实上，该组遇有行程路线、选票填写等明白提出的问题，一般的方案是由龙提议，刘点头而后肖默许的。而另一位是肖家一青年村民，跟着陈书记组。陈书记还独自确定主任候选人陈凡平，形式上也报经乡里批准并经选委会通过。而关于刘国顺的参选与落选陈之作用依然昭昭²⁰。此外，选举时组长陈贯清和刘国顺负责在本组找人（投票），也使得村民对选举生疑。毋庸讳言，由于村干部分布集中于大姓（大村），大多数小村的村民对选举结果也失去信心。曾家组长钟就直言不讳对笔者说，虽然他认为99年选举不如人意，但今年选举更是组织操作的结果，“根本就没有小姓小村的份”²¹。在2003年1月19日我们课题组的调查交流会上，大部分调查者也都发现，2002年选举与99年选举相比，同一个村乡村组织的操控更为明显，问题更突出：如河江村，组长利用晚上代选民填了许多票；新坪村，候选人将不利于自己的选票从开口的票箱中“抓了一把”出来；尺江村“组长包干代劳”，并未发票给选民；曲斗村“提票箱者都能多得票”，等等。

可见，乡村组织肆意践踏民选结果，选举中出现诸多违法操作，以及选民对99年选举结果的失望，导致了村民对选举的冷漠。

（2）聚焦于治理

如果说，选举是村民们三年一遇的“治理的焦点性事件”的话，那么村级治理则展示了干群的日常互动；如果说，选举跟村民的利益还不算直接勾连的话，那么村治中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则可能时刻影响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换言之，村治过程中干群的日常互动也一点一滴积累着农民对干部的深刻印象。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高坪村治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危机”²²。

首先看政务和村务的处理。政务的执行上，有三种情形造成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危机”：一是村级组织的克扣“卖蔗款”，二是乡村组织的上门“行动”，三是税费改革的上下不一。分述如后：高坪是一产蔗区，大部分村民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甘蔗。但是，往往“甘蔗丰收农民歉收”，因为这成为村干部收取税费的主要途径之一²³。因为无论收割的先后、款项的返还糖厂都直接与村组织交涉，换言之，村组织是市场与农民的桥梁或中介。在糖厂将蔗运出村里之前，村组织就会按称好的重量给蔗农开“白条”。以后糖厂将各户的卖蔗款一并由村组织凭白条转发给蔗农。然而还未等蔗农见到现金，村干部便已将它克扣下来，当作这些蔗农的“上交”。对此，村干部也直言不讳²⁴。这意味着本来这收入还可在农民手中作一周转资金，但是由于迟迟见不到现金，自然对村组织很无奈乃至愤恨。在选举期间，笔者就见到时有村民来找陈书记或刘主任问何时可以“结帐”。值得注意的是，村组织并非立即将克扣的蔗款交给镇里，有时也挪作私用。其二，乡村组织的联合收“上交”。对待非蔗农（当然还有一些蔗农），乡村干部往往是联合拔“钉子户”，甚至“不惜”违法。在与笔者闲聊中，对选举丝毫不感兴趣的驻村干部郭氏介绍高坪情况时对自己在收上交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却津津乐道。由于收上交而发生的干群冲突并不少见。当然，这类行动，村干部一般是领路，发生冲突时劝解，主要由乡干部出面。99年调查期间，笔者亦得知，陈书记与刘主任都曾带乡干部上门收上交，陈书记由于乡干部与陈家村民冲突时反而站在前者一边而让陈家不少群众对之怨恨不已。匡家的不少村民也成为“钉子户”，因而笔者两次驻村与其交流时他们对干部常常是开口即骂。三是税费改革得不到充分落实。本来税费改革的实行，

村民负担有所减轻,农民对此毫不隐瞒且表示由衷欢迎²⁵。然而,村民们仍表示不满,原因是“水费”未免。但事出有因。该省新一届领导人曾接连发出三封“致全省农民的公开信”,对减轻农民负担作了承诺,其中对“水费”的规定尤其让高坪村民欢欣鼓舞:谁受益谁上交!村民们认为,高坪年年水灾不断,洪水常常危害于民²⁶，“水费”自然在减免之列,然而乡村组织仍然照收不误,刘主任说,“能理解群众的怨气,但仍得照办,希望群众能去申诉,能成功则免得我们工作”。于是,在农民看来,由于基层干部“不按上面政策来办”,由税费改革带来的实惠为此大打折扣,农民负担减而不轻²⁷。新居村一屠户虽家庭经济尚可,但在笔者对他人作问卷时他插话说“土政策极恶”、“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然而村干部则反映,任务主要是“上面压下来的”,他们经常拿不到应得工资或补贴,反而要贷款或贴钱完成上交任务²⁸。相对而言,各项政务中,计划生育工作已不难开展(从专干由刘祥云担任也可知),征兵更被村民视为一种荣耀,唯有税费成为难题。在笔者主持的组长座谈调查会上,几乎所有组长都认为村干部面对任务“不硬”、“不敢顶”,不能代表群众利益,而只是一味迎合上级。可见,村干部也有一定的苦衷,而这就联系到体制性因素。

与对政务的“积极”态度相反,乡村组织对于村务投入很少,甚至没有将其列入其日常议程。就笔者三年后重访高坪所得印象,农村社会的发展几无进步。从高坪年复一年爆发的洪灾、日益破旧的“两委”办公室(就在村小的教室旁)、坑坑洼洼的各村要道等村情村貌都无情地述说着这一事实。以群众较为关注的防洪建设而言,乡村组织对之也无能为力。谈及这些,刘主任一脸无奈:“哪来的钱?”的确,没有企业,资源不富,灾害频繁,村组织的“小金库”似乎早就空了,往年的收支情况只有“欠”一个字。按理,发展农村经济也是乡村组织一大要务,但无论从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包括防洪设施建设的投入),还是经济发展本身举措,以及乡村干部关注的对象都说明这不过是“空话”,甚至连“空话”都懒得讲了。在高坪不少村民看来,他们在急需帮助时往往得不到干部的帮助。“只有靠自己”,村民对发家的认识更趋一致。

倘若“穷庙穷方丈”还可躲避道德的谴责,然而乡村干部的吃喝风、村干部的生活方式似乎说明了问题所在。据笔者之所见所闻,尽管村组干部大多说作干部没意思,但他们其实还是留恋于此的。选举期间,本来应该节俭开支,但一天二顿少不了,一餐就至少两桌人,2002年选举晚餐光打一条狗就三百元。对此,村民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三年村干部,一栋新楼房”。比如陈书记,“既没农业收入,又没技术,但生活好得很呢!”

总之,99年选举并没有对村治产生积极的影响²⁹。事实上,不仅仅是当选村干部的行为,而且无论是乡村关系、陈刘二人代表的“两委”关系³⁰,还是村民小组或村民间的关系都未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由于“上交”和村务过程中干部之所作所为而产生的对干部之“失望”日积月累,使得农民对选举更加冷漠,然而,税负问题这一“干群心中的痛”之难解,还有更深层的缘由。

(3) 结构性因素之一: 制度及体制性局限

学者认为,在政治制度方面,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和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的高层化,以及在政治参与体制方面政治参与的渠道极窄和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很小,导致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冷漠(刘德霓,2002)。从高坪来看,这主要体现在,自上而村通行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长期以来盛行的任命制,也使得群众深深怀疑能“自下而上”地实行民主选举。如所周知,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在村级组织中,村委会要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而这两个组织常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所谓“两委”的关系一般都落实为村支书与村主任间的个人关系。在大多数中国行政村,一般是村支书权高于村主任,当然也有少数村由于村主任个人能力及其它方面条件超过村支书而成为“核心人物”,支书也只有“听从”的份儿。但不管谁实权更大,两人的日常关系总免不了矛盾甚至明争暗斗。这正是由于体制制

约的结果。高坪的村民大多知道，本村是书记说了算，尽管陈书记无论能力还是水平、群众基础都不如刘主任³¹。当然，也有极少人认为刘并非一个“好村官”³²，但若在他与陈之间选择，大多数村民会不假思索选择刘。这就意味着，党的一元化体制由于高坪这一特殊情况，而更让村民无法接受。因而他们借助选举一再表示：“希望能由大家来选村书记”，因为仅仅让村民选举村委会干部，不让选书记则更加改变不了高坪的现实，用处不大。再者，高坪99年至2002年三年间一共换了五位组长，尽管也让小组自选，但村组织的主导作用也反映了任命制的盛行。用村民的话来说：陈书记说谁当就谁当，反正群众也不会去争，无所谓。这后面，其实意味着群众对本村“民主选举”的习以为常乃至深深怀疑。

体制性的制约不仅仅是体现在村级，其实行政村不过是其末稍而已。尽管村民大多不能确切描述这一具体体现，但村民并非不知道由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都是这一体制。他们常常是这样描述的：“上面都是书记大，村里怎么变得了？”“仅仅让我们选村干部，上面不变，那一切都是假的”。更有甚者，尽管说不出乡级以上地方政府“头头”名称，但经常会脱口而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现身说法”。在他们看来，中央一级最高领导从来都是书记，而干部也是出于任命，因而地方上也必须这样³³。

因而，在村民眼中，书记一把手制，干部任命制之盛行，哪会有真正的民主选举？

（4）结构性因素之二：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从农民心态与行为去开掘导致农民冷漠现象的“诱因”，无法忽视“社会根源”，若从更深层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亦影响了农民之“政治心理”。

由于儒家文化在20世纪初的破坏，当代中国财产制度的破坏（产权制度缺失），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及政府的短期行为（张维迎，2003），以及改革前的单位制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郑也夫，2001），中国社会现阶段存在很大的信任危机（张维迎，2003）。而美国学者福山根据对美国日本德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德比较后认为中国人际信任度极低（福山，1998）；郑也夫对中国社会盛行“杀熟”的分析（郑也夫，2001）的观察，还有报刊媒体所载难以数计的各种“假”物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感受等等都证实了这点。北京近期频繁出现的上访事件也意味着中央面临的社会压力日益直接，成为“社会压力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基层政府则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誉危机。当我们将视野从中国“大社会”转移到高坪这个“小地方”时，我们发现，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信任危机已经“危急”到这个村庄了。村民们常常挂于嘴边的是：现在社会风气就这样，变得太坏了！在他们列举的可作为社会信任危机的体现的是：村干部道德变坏了；一切向钱看；人人只顾“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高坪，我曾遇见两位颇为健谈、说话较为大胆的陈家人³⁴，以下是他们的原始描述：“选举对我们影响不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生存。真正有才干者会选择外出或求其它职业，而不会做村干部。社会风气这么坏，谁（作干部）都改变不了。”“农民很直接，也很实际。”“我常常告诫我的小孩，只有读好书，才能有出路。”从问卷调查来看，这种心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自然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心理。

5. 余论

以上分析，笔者试图指出的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源自于一种对乡村组织、选举以及政治体制的极大不信任，同时又受到中国当下社会信任危机的影响。进一步说，农民的这种冷漠是一种作为“弱者的权力”（詹姆斯·斯科特），它不仅仅包含了对利益的考量，而且蕴藏着他们对权利、尊严以及认同的诉求，而亦揭示了农民这种多元追求并未得到起码的满足，它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农民冷漠是好是坏？事实上对此问题存在争论³⁵。在此笔者无意介入这种争论，而只想问，如今日益增多的农民“反抗”是否就缘起于我们对底层日积月累而成的冷漠的忽视呢？如果将农民冷漠与村民自治联系起来看，也许我们对村级民主的

现状不可高估，而中国民主的发展路径可能多元，城镇先行也不是没有可能^{3 6}，而最近出现的北京、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以及更早的大鹏选举、四川步云乡等地的乡镇及其以上选举所体现的点点滴滴，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民主发展的多重进路的源泉。

参考文献:

- 1、李连江主编，《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2、戴利朝，《高坪村选举观察报告》，载同前。
- 3、刘亚伟编，《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西北大学2002年版
- 4、郭正林著《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项继权著《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和成效》，载同前。
- 5、肖唐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6、唐娟、邹树彬主编，《2003年深圳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版
- 7、杨光斌，《政治冷漠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 8、刘德霓，《当代中国政治冷漠现象成因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2，(1)。
- 9、[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国家的政治参与》。宁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1页
- 10、[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1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 12、【美】福山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 13、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 14、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附录

各组村民负担统计表(2001年)

小组	户数	人口	耕地 (亩)	农业税 (元)	乡统筹	村提留	各种规费	组提留	老欠款	特产税
新居	27	100	149.96	2783.5	2759.8	1349.6	1597.3	300.1	1628.5	582
匡家	49	190	257.39	4509.1	5067.7	2316.4	2769.3	514.7	9284.3	999
肖家	43	151	278.04	4503.5	4497.4	2502.6	2909.8	556.2	3995.2	1080
陈家	78	290	334.23	5392.5	7359.4	3008.5	3660	668.6	5566	1298
龙家	31	108	222.98	4011.9	3371.1	2006.8	2313.9	445.8	4377.34	866
曾家	25	80	164.91	2566.9	2495.1	1484.5	1711.1	329.6	2507.5	640
岭背	44	168	261.88	3655.4	4699.5	2256.9	2779.1	523.7	4666.3	1017
下屋	25	96	165.10	2379.7	2784.4	1486.1	1737.2	330.3	3407.9	427
栗湖	21	82	110.00	1632.1	2180	9903	1184.8	220.1	3905.4	427
合计	343	1265	1944.49	31434.6	35214.4	17501.6	20662.5	3889.1	39338.94	7550

注：1、各种税费单位统一为“元”；

2、上表中各种税费标准是：乡统筹（两级办学：每人10元、每亩6.4元；训练费：每人1元；优待金：每人4元；计生费：每人3元）；村提留（每亩9元）；各种规定收费（水费：每亩1元；民工建勤：每亩4元；电影费：每人3元；科技承包：每亩0.25元）；组提留（每亩2元）；特产税（每亩3.883元）

Countrymen Apartness and Its Reason i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thought of Gaoping Village Election

Dai Li-chao

Abstract: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by countrymen is already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easants political lives, but it is still unknown that how peasants react in reality. This paper will show the countrymen apartness i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and its reason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Gaoping village election.

Key words: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countrymen apartness reason

¹ 本文系肖唐鏢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99年末，笔者在高坪作了为期20天的调查，2002年底，笔者再次来到高坪，花传国先生协助调查三天（30日我们各跟一个流动票箱），另外的调查由笔者单独进行，此间笔者通过与村民通信和电话保持联系不断补充调查。

² 他是骑着自行车跨越岭背村与肖家村相连的田埂而来，其实那田埂也是岭背片村与肖家、陈家二片村间的地理桥梁，有关高坪三个片村及其自然村村情的概况介绍，请参见拙文《高坪村选举观察报告》（戴利朝，2001）。据了解，刘会计的那辆车除上街外，他主要用来工作：骑着它，有时一天两三趟，刘反复地跨越那田埂，到位于肖家的村委会办公或到陈书记家商量工作。或许可以对比的是，家离村委会一近一远的陈书记与刘建华主任都是骑着摩托车到村委会的。高坪有村民说，自行车与摩托车，这是两种工作作风的反映。

³ 来到陈家，我们转悠了一圈，只完成了几户人家，10点多，刘又叫组长陈贯清叫人，但来者寥寥。龙提议午饭后再搞，赶圩（集）的村民该回家吃午饭。但我们到村委会后不久，陈书记这组已完成整个肖家片的流动选举回来了，当他得知陈家投票很少时，他要我们重返陈家，理由是下午还得赶到岭背，时间很紧。

⁴ 有关高坪1999年选举的背景、经过、结局的详细介绍和相关讨论，请参阅拙文《高坪选举观察报告》。

⁵ 这是我们课题组在2003年1月19日召开的调查总结座谈会上的共识。如在游家村，“集中到中心会场的仅有20人（选民共637人），原定于9点开始，后推迟到11点”。当然也有不同的发现，如据2002-2003年挂职于L县的学者邱新有（也是课题组一员）调查，该县2002年的选举比99年更激烈、更民主，与课题组在同一省另外两个县的普遍发现恰恰相反。其问题在于，L县99年选举状况如何？未必是与这两个县处于同一水平。

⁶ 如有学者判断，“在当代中国，从总体上看，政治冷漠现象在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多项调查统计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一直不高，尤其是农民，无论是政治参与的次数和参与的程度都很低。”（刘德霓，2002）当然，作者未注明其依据的“多项调查统计”的具体来源，且不是对农民政治冷漠的专门研究，而属宏观判断。

⁷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冷漠（Political Indifference）是相对于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一个政治概念，实际上“就是政治不参与的统称，即公民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对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采取淡漠的态度，它以政治触角的迟钝和政治热情的衰减以及大量游离于现实政治意志之外自在自为的远离政治活动的社会群体为标志；即使参与政治活动，也是消极、被动和不自愿的”（刘德霓，2002）。从高坪案例来看，这种定义并不全面。

⁸ 陈刘之争，含义至少有四：一意味着当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二意味着陈氏宗族与刘氏宗族之争，前者即陈家村陈姓村民，后者包括岭背与下屋村全体村民；三意味着陈家村与岭背村，也是两个村民小组之争；四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陈家片与岭背片两个片村之间的竞争。

⁹ 当31日陈书记在选举会议上宣布（以“乡里某领导的旨意”）这一决定后，刘国顺就对笔者表示：这是让他“失面子”，往他脸上“抹黑”，自己会要求选委会写申明贴到岭背（向村民解释，因为“村民意见很大”）。他并对刘祥云说，今后不会配合村里收“上交”，不会支持村里的工作。选举结束后，03年1月1日我在岭背村访刘。刘国顺这样说：“在选举前，我就知道，我会跟上次一样，即使被选上也肯定会

被(陈)书记拿掉。没意思,书记昨天(31日)说,可以设委员3名,多开一个干部的工资,被我拒绝了。我不图这500元一年的工资。”言下之意,陈贯清以选上的名义进入村组织后,而陈书记可让刘落选后也可以成为村组织一员。当我问道,村委会全是刘氏,是否难以开展对陈家的的工作?他显得从容:“我若进村组织,有方法开展对陈家的的工作,他们(指现任班子)无能,可我有办法。我当(岭背)组长以来,就是改变了这里的面貌,为百姓作实事。”而据刘建华的介绍,陈书记安排贯清,“满以为有把握”,但结果出乎他所料。

¹⁰ 这一说法笔者未在镇干部处得到证实,但这种安排显然既避开了陈贯志“下台”(可在选举后留任),又避开了让刘主任面临竞争的风险(这两人竞争未必就是刘终胜,毕竟许多工作陈书记还离不开对刘的依赖)。而将陈贯清列入委员候选,进入村委会,也可弥补曾礼明留下的空缺,村委会可形成陈刘均衡之势。

¹¹ 陈的解释是,“公社临时通知说陈贯志上半年受过处分,不能作候选人。我就定了陈凡平。凡平高中文化,参加过农业普查,近几年因在中学煮饭,酒量有增加且善于交际,能力影响扩大了许多甚至超过乐平,且其妻子系新居村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他并不清楚预选时陈凡平所得票数,而且认为正式选举凡平肯定落选。事实上,趁着元旦他放假回家的机会,笔者一大清早到凡平家,他告诉我,他没有参加选举,更不知道自己是候选人,而且是主任正式候选人;他对选举或谁当都无所谓,只是一再强调,由于2000年刚建新房需装修和还债,还有小孩都在上学,搞家务挣收入才是最重要的。就在30日投票时,其爱人对选票上有自己丈夫名字也是大吃一惊甚至有些激动。这些都表明,老实巴交的陈凡平之成为正式候选人,完全是陈书记使然。

¹² 99年选举中他还参加动员和组织群众投票,而因此为部分选民质疑。

¹³ 贺雪峰先生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它指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而若一个村庄中的所有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则该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或社会关联度很低。据此标准,作者依据调查发现,认为当前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社会关联度低(贺著《新乡土中国》,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又见于贺著《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未尝不能发现,村组干部以及乡镇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他们却构成农村社会的高度“社会关联”。

¹⁴ 当刘会计匆忙而庄重地到镇上印刷选票等相关选举材料时;当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组长以及老党员、群众代表共20人在内的村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并选举成立选委会之际;当选委会将一张张印有村民名字的大红纸贴到各村村口时;当从海选到正式选举再到走村串户复选时;当“沿溪乡高坪村第四届村民选举候选人提名大会”的横幅,“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树立全局观念,选出最好班子”的对联以及“候选人提名办法及要求”、“村委会选举第二号公告”在村委会投票现场触目可见时;当彭副乡长与陈书记、刘建华主任等选委会成员一道出现在匡家村口拦住外出的农民说:“投票选举村委会,这是你们的权利!”“请到大队去投票”……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起初对民主选举半信半疑甚至完全怀疑的那些村民发生了心态上的一定转变,他们参与了选举,没有直接参与投票而忙着自己的活儿的村民也同时关注着这件新鲜事,无论在现场还是在蔗田、茶馆、赶圩路上,都可听到对选举的议论。而不少村民并没有受到动员就自己赶到投票点投票,而且一样的认真。

¹⁵ 99年我们课题组在其它许多村庄观察到村民这种对选举的心态和行为,比如在与高坪同镇的中村,面对选举结果,部分村民表示:因为是第一次,要是第二次就不会这样了。这些在报告中都有详实的描述,说详肖唐鏢等著(2001)。

¹⁶ 有关刘个人及其能力的详细介绍,可参见拙文(戴利朝,2001)。这里仅举两人的看法为证。在刘建华眼中:刘祥云虽高中毕业,但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其基础不如组长刘国顺(笔者2002年选举时对刘的访问);在村民龙一游眼中,刘没有办事能力,作为治保主任处理不了村民纠纷,高中毕业却没有作会计的能力,因而2002年选举在所有候选人中首先排除他。两届选举中对刘的两次专访给笔者的印象是能力与外表一样柔弱,老实并不健谈。

¹⁷ 据刘国顺反映, 1 日上午在镇上一家茶馆喝茶时有肖家片的村民说“这些组织都是黑社会组织, 民选不作数。”但笔者问他都有哪些人时, 他说不便公开, 因此说还未得证。

¹⁸ 11 月 9 日成立选委会, 标志着选举启动, 进入宣传准备阶段; 11 月 23 日选委会公布选民名单; 其间各组提名选举初步候选人; 12 月 8 日选委会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 13、14 日正式选举, 分设陈家、村委会和岭背三个投票点; 由于第一次未决出副主任, 15、16 日用流动票箱举行第二次选举。

¹⁹ 一次是在 30 日流动选举临近中午郭氏随同刘副镇长到陈家观摩, 午饭后两人就离开了高坪, 其它村根本没去; 另一次是, 镇里张书记一行六人 31 日到村委会安抚“落选者”刘国顺, 并用晚餐后离开。

²⁰ 31 日选举结果一出来, 陈见贯清票少, 说要去镇里请示, 返回后随即召开选委会。宣布乡里的“裁决”。据他说, 镇里张书记认为如刘上, 则不便开展工作, 要让贯清上。而下午, 张书记一行到高坪, 晚餐时他还单独向刘国顺敬酒, 并说: 要以大局为重。这意味着肯定了陈的说法。

²¹ 99 年, 曾家的曾礼明就是正式候选人, 且成功当选。2002 年的正式候选人则只有陈刘二姓, 加上一个肖家组的刘贤花。肖家还算一个大村, 新居又与之同属一宗族, 因而也分得一干部席位, 尽管发言权最小。其实, 对小姓、小村而言, 由于没有自己的代表, 不少村民认为选谁都一样。而对稍次于陈家的刘姓而言, 在他们看来, 因人口比陈家少, 竞争不过后者, 也失去信心, 因而难以积极参选。这是 99 年相对公平的选举和几十年来高坪的村干部分配经验告诉他们的道理(戴利朝, 2001)。而多数村民包括陈家人在内都有“选谁都一样”的看法。

²² 在回答当前中国社会“信任何以被破坏”时, 有学者认为政府行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政府的权力太大, 对政府的约束不够, 人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就会无所适从, 当然就不会讲信誉, 就不值得信任。”还有, “政府的短期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信任的建立”(张维迎, 2003, 21 页)。高坪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信任危机正是由后者在日常村治过程中的“为所欲为”甚至是“无法无天”累积的产物。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信任其实是相互的, 调查表明, 乡村组织对农民也有不信任感, 其体现不仅在于他们一直认为“农民文化素质太低”(也许仅仅是借口, 他们更可能是担心, 素质太高的群众会合理合法地捍卫自身的权益), 而且在于他们对选举效能持很大怀疑, 他们坚持相信: 民选出来的干部将“不会听话”, 导致“工作难开展”、“税费任务不能完成”。如陈书记认为, 民选的干部“缩手缩脚, 不敢大胆工作, 尤其是收上交时。”

²³ 有关高坪产蔗、收蔗以及围绕卖蔗结算等问题, 说详拙文(2001)。

²⁴ 刘建华主任常常说: “要是肖家片各村都产蔗的话, 我们收‘上交’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事实上, 由于肖家片蔗农很少, 最令村干部头痛的就是肖家片的上交任务。

²⁵ 据笔者的调查, 村干部和村民都认为“税费改革的确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

²⁶ 就在 2002 年 10 月, 高坪再一次遭受洪灾, 积水达 3 米多高, “整个全镇干部及附近三个村村民赶来支援, 否则肖家片三个村都将被淹”(12 月 31 日刘主任心有余悸地对笔者如是描述)。村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而曾家湖村由于地处防洪堤外, 受灾常常属于最重。为减免今年洪灾损失, 曾家组长钟兆文 31 日斗胆“上书”来到高坪的本镇张书记, 张自然未同意他的请求, 理由是不可能厚此(村)薄彼(村)。

²⁷ 在笔者家乡, 由于经常闹旱灾, 村民对省里的三封信尤感振奋, 但由于与高坪村民一样仍得交纳“水费”, 也生不满。

²⁸ 2002 年做完问卷后, 陈书记似乎动情地对笔者说: “下次你再来时我可能就不是书记了, 我也不愿当干部, 因为上交任务完成不了, 经济压力很大。去年为了完成任务, 我垫了 5 千元, 加上以前的有 1 万以上贴了进去, 去年还没领到一分工资, 我担心像乐山村书记被乡里免职后, 为自己所垫出的 2 万元躺在床上三天三夜都想不通, 却又无可奈何。去年刘主任未垫, 因为他在 98 年垫了 2 万元, 其他人的垫数是: 刘会计 2 千元、刘祥云和刘贤花、陈贯志各为 3 千, 还有肖平而 4 千。”刘建华和刘祥云也表示常常垫钱完成上交。

²⁹ 正如陈书记和刘主任分别接受问卷调查时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选举对干部工作影响不大, 没什么区别”。如何评估选举给农村社会带来的真实影响? 主要是看选举前后的村治效能和农村政治文化的变化。从前者言, 主要看村干部行为是否发生变化? 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如前所述, 高坪选举前后村治“一个样”, 甚至效能更为低下。其它村呢? 课题组发现, 选举后三年, 在坎下村, “村干部依然忙于收

税费，公益事无人管”；在新坪村，村民认为“选出的干部与以前的没什么差别，也是‘三要’（要钱、粮、命）”。这些观察尽管只反映了干部的作为，但由此可想见村治的效能。因为在当前大多数农村的事实是，减负即等于让农民富裕。依靠乡村组织为村民带来实惠主要还是在“税费”的减轻，换言之，在农民眼中，发家致富得靠“自力更生”，“村干部是靠不住的”，也不想“靠村干部”，只要负担问题解决了，他们对村官也就满意了。

³⁰ 陈刘关系甚至更加貌合神离，在陈看来：刘因为常帮人家吹喇叭，且种甘蔗，比较忙，村民有事多找陈，因为找不到刘，甚至2002年镇里张书记两次来也不见刘。刘却说陈是大权独揽，包括现金支出、开蔗票（打白条）、发补贴、领补助等，所以村里的事他也懒得管，2002年他“未过手一分钱”（本来主任是财务一支笔）。龙期茂说，陈“大事小事一把抓，主任也几乎让他，既会做人也躲掉了工作（工作很难做）”。

³¹ 还在99年选举前，党支部会议上民主评议的结果就是刘主任得票数大大超过陈书记；99年选举中就有村民希望可以选刘作书记；村民平常有事大多会找刘而不会找陈；99年选举结果也表明刘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戴利朝，2001）。

³² 陈凡平在99年、2002年与笔者交谈时都表示：刘并没有为老百姓办多少实事。龙一游99年认为刘其实就很圆滑，会做人；2002年也是这种看法。岭背刘国恩老人认为刘其实也不会为群众办实事，只会“为自己腰包”。笔者的问卷有道题问“您对现在的村委会主任满意吗？”大多数人回答，一般，没做什么实事。

³³ 普通百姓是这样，乡村组织干部不少人也持此论。两次选举期间，据笔者对该镇乡村组织干部的调查，他们大多强调党的领导不可能动摇，必须要像上面（他们举例说，县里选举就这样）一样进行组织化操作，村民选举才可进行。换言之，干群普遍不信上级政府能实实在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选对任命的替代。

³⁴ 那是一位青年村民与一中年人（拄着双拐），前者一家四口，自己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作木工，妻子主内，一女打工，儿子读初中，自叙家庭收入逾万元。后者一家四口，夫妇俩为商品粮，有正式工作，儿子在县城打工，老母亲在家，家庭经济更好。

³⁵ 早在1995、1996年，《读书》杂志曾就“政治冷漠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刊发过简短的争论文章。

³⁶ 据学者研究，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已在酝酿、形成并壮大，而且对上至市局级干部，下至乡镇党委书记的调查表明，60%的官员认为可以搞竞选，这意味着体制内官员对民主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以及改革的基础和动力越来越强（肖唐镖，《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对村民自治的一项效应与后果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3，（1）；肖唐镖在“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案例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唐娟、邹树彬主编，《2003年深圳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版，386-388页。）。